

马克思主义研究译丛



超越资本

——关于一种过渡理论
(上)

[英] I. 梅扎罗斯 (I. Mészáros) 著
郑一明 等 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超越资本

—— 关于一种过渡理论
(上)

[英] I. 梅扎罗斯 (I. Mészáros) 著

郑一明 等 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超越资本——关于一种过渡理论 (上下) / [英] 梅扎罗斯著; 郑一明等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2

(马克思主义研究译丛)

ISBN 7-300-04502-2/B·296

I. 超…

II. ①梅…②郑…

III. 资本主义经济—经济理论—研究

IV. F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99547 号

马克思主义研究译丛

超越资本

——关于一种过渡理论

(上下)

[英] I. 梅扎罗斯 (I. Mészáros) 著

郑一明 等 译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239 (出版部)

010-62515351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河北涿州星河印刷厂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16

版 次 2003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张 73.75 插页 4

印 次 2003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1 232 000

定 价 79.00 元 (上 下)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马克思主义研究译丛

总 序

马克思主义产生之后便对全人类的历史进程发生了重大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仅表现在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也表现在非共产党执政的资本主义国家；不仅表现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发展中国家，也表现在经济文化先进的发达国家。其实，在发达的西方国家，马克思主义始终是最有影响的社会思潮之一。在这里我仅想谈谈马克思主义对当代西方社会科学的巨大影响。

一个令人深思的现象是，不少在世界范围内影响卓著的社会科学家都与马克思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中有一些直接就被冠以“马克思主义者”的称号。美国的马尔库塞、法国的萨特和意大利的葛兰西，都曾经是西方世界最有影响

的学者和知识分子，而他们都被认为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法国的解构主义大师德里达、德国“最有影响的思想家”哈贝马斯、英国首相布莱尔的“精神导师”吉登斯和美国后现代主义代表人物詹姆逊等，都是现今公认的在国际上最有影响的著名学者，他们在各自的领域中执掌着社会科学的牛耳，而他们对马克思的思想在相当程度上持肯定的态度，其中有一些则被认为是西方的“马克思主义者”。

除了造就一批声誉卓著的国际著名学者外，马克思主义对当代西方社会科学的影响还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促成了新的学术流派的诞生；二是开拓了新的社会科学分支学科。

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科学盛行过许多思潮，其中影响最大的有三种，即新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和新马克思主义。所谓新马克思主义，就是西方学者试图按照他们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现实作出新的理论解释。新马克思主义是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直接影响下产生的，是经典马克思主义在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变种，这最集中地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对当代西方社会科学理论的巨大影响。这种影响几乎体现在人文社会科学的各个主要领域，例如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人类学、哲学、文学等，例如有所谓的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新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新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等。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社会科学出现了许多新兴的分支学科，其中有一些分支学科与马克思主义直接有关。例如，新政治经济学和政治社会学，这是两门极为重要并有深远影响的新兴学科，它们的产生与马克思主义有着深刻的渊源关系。以政治社会学为例，它有两大理论来源，其一是马克思的理论，其二是韦伯的理论。美国著名的政治社会学家安·奥勒姆曾这样说：“马克思可以说是政治社会学之父，正如奥古斯特·孔德可以称为社会学之父一样。毫无疑问，由于种种原因，马克思轻视了这个题目，但是，显而易见，马克思创立了许多比任何热衷于政治研究的社会学家——活着的和死去的——都更富有挑战性和更富有成果的思想。”^①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对当代西方社会科学具有如此深刻的影响，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如辩证法、唯物史观、阶级分析方法等本身对自然界和社会发展具有极强的解释力，至今仍有着很强的生命力。二

^① [美] 安·奥勒姆：《政治社会学导论》，14页，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



是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观，即消灭剥削和压迫，充分发展人的个性，解放全人类，最终实现“自由人的联合体”，仍然是许多进步的和正直的学者所憧憬的理想。三是不少杰出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不是死抠书本，而是始终站在时代和学术的前沿，对新出现的现实问题及时作出理论概括。

国外马克思主义者的许多观点是我们所不能赞同的，但他们当中的有些人终生研读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文本，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本身多有独到的发现；有些人则将着眼点放在重大的现实问题和学术前沿问题上，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提出了富有时代意义的新解释；有些人则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对当代资本主义作出了深刻的分析性批判，所有这些都非常值得称道，也值得我们借鉴。

马克思主义理论要与时俱进，一方面必须将马克思主义与现实紧密结合，在实践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另一方面，必须充分吸纳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其中当然包括国外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成果。中央编译局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所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处的同志们，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合作，经过艰苦的努力，陆续推出“马克思主义研究译丛”，所希望的也正是为国内有志于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学者提供一些可资借鉴的新视角、新观点和新方法。中国的学者如果要无愧于“当代马克思主义学者”这个称号，就必须在真正读懂马克思主义原著的基础上，始终站在时代和科学的前沿，善于吸收一切优秀的学术成果，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和价值观，而不是用它的个别条条或个别理论，去观察和分析当代世界，特别是当代中国的重大现实问题。

俞可平

2002年7月29日晚
于北京新风南里寓所

通过辩证的发展，主观的利己主义变成特殊过渡到普遍的中介，因此每个人在为自身赢利、生产和享受时，实质上也在为其他任何人的享受生产和赢利。引发这种情形的强制根源于个人对整体的复杂的相互依赖性，它如今将自身作为普遍永恒资本呈现给每个人。

——黑格尔

资产阶级社会的真实任务是建立世界市场（至少是一个轮廓）和以这种市场为基础的生产。因为地球是圆的，所以随着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的殖民地化，随着中国和日本的门户开放，这个过程看来已完成了。对我们来说，困难的问题是：大陆上革命已经迫于眉睫，并将立即具有社会主义的性质。但是，由于在极为广阔的领域内资产阶级社会还在走上坡路，革命在这个小小的角落里不会必然被镇压吗？

——马克思



马克思主义研究译丛

目 录 (上)

导 言	(1)
-----------	-----

第一部分 失控的幽灵

第一章 破除“普遍永恒资本”的符咒	(19)
第一节 超越黑格尔的遗产	(19)
第二节 第一个全球概念——论“历史的终结”的前提	(26)
第三节 黑格尔的“普遍永恒资本”： 利己主义的个性和抽象共性的 虚假中介	(31)
第四节 《历史和阶级意识》对“链条 的最薄弱环节”的封闭革命的	



典型概括	(39)
第五节 马克思的未被探索的可供选择的观点：从“小小角落” 到资本全球统治的实现	(52)
第二章 资本的社会新陈代谢再生产的秩序	(65)
第一节 资本制度中控制的结构性缺陷	(65)
第二节 资本的补偿规则和国家	(77)
第三节 资本的物质再生产结构与其国家形态之间的失调	(94)
第三章 从资本的立场看资本失控之解决	(106)
第一节 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解答	(106)
第二节 “边际效用”和新古典经济学	(114)
第三节 从“管理革命”到假定“技术体制融合”	(127)
第四章 因果关系、时间和中介形式	(154)
第一节 资本的“自因”之下的因果关系和时间	(154)
第二节 资本的第二序列中介的恶性循环	(159)
第三节 历史偶然性的永恒化：哈耶克的资本辩护学的致命 自负	(169)
第四节 资本关系的生产性限制	(179)
第五节 初级社会再生产中介与积极选择的异化结合	(186)
第五章 资本绝对界限的激活	(199)
第一节 跨国资本与民族国家	(208)
第二节 社会新陈代谢再生产条件的破坏	(226)
第三节 女性解放：实质平等的挑战	(242)
第四节 长期失业：“人口爆炸”的真正意义	(280)

第二部分 社会主义批判的历史遗产之一：俄国革命 范围内物质中介与制度中介的挑战

第六章 卢卡奇的悲剧与选择的问题	(327)
第一节 飞速的时间和迟到的预言	(327)
第二节 寻求“自主人格”	(332)
第三节 从《灵魂与形式》的困境到《历史和阶级意识》的 行动主义视野	(341)

第四节 重申选择问题·····	(347)
第七章 从黑格尔“世界精神”的封闭视界到断言社会主义	
解放的规则·····	(356)
第一节 认识的个人主义观念和社会互动·····	(356)
第二节 《历史和阶级意识》中的“总体化”问题·····	(363)
第三节 “意识形态危机”及其唯意志论的解决·····	(366)
第四节 卢卡奇的方法论假定的功能·····	(377)
第五节 “被赋予的阶级意识”的实体化·····	(381)
第八章 “比黑格尔更黑格尔化”的局限·····	(393)
第一节 对韦伯的合理性的批判·····	(393)
第二节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失落的天堂·····	(408)
第三节 卢卡奇的“同一主客体”·····	(416)
第九章 理论及其制度背景·····	(439)
第一节 历史具体化的承诺·····	(439)
第二节 改变对工人委员会的评价·····	(447)
第三节 卢卡奇的中介范畴·····	(457)
第十章 政治与道德：从《历史和阶级意识》到《民主化的	
现在与未来》，再回到未写完的《伦理学》·····	(466)
第一节 诉诸解放意识的直接干预·····	(466)
第二节 “艺术与科学的游击战”和知识分子“从上层”进行	
领导的观念·····	(472)
第三节 赞美“地下舆论”·····	(479)
第四节 资本的第二序列中介与赞同作为中介的伦理学·····	(482)
第五节 伦理观念的政治界限·····	(490)
第六节 卢卡奇最后政治遗嘱的局限·····	(496)



马克思主义研究译丛

导 言

马克思 1858 年所说的世界的“小小角落”不再是小小角落：资本制度不断扩张的浸透这一严重问题正把它们幽灵投射到四面八方。因为资本的历史优势——马克思 1858 年 10 月 8 日在致恩格斯的信中曾经不得不承认它的令人不安的存在——迄今在“极为广阔的领域”也已完全确立。今天，我们生活在为资本的统治所牢牢控制的世界中，生活在一个无法履行诺言和极其令人失望的时代，只不过暂时受到顽固信念的挑衅。

对许多人而言，当前的事态似乎基本上是不可改变的，这只是在顺从“普遍永恒资本”的要求方面，与黑格尔将思想和行动概括为正当和恰当——或者用其自己的意思来说“合理”——是



相符合的。然而，这种对命定的不可改变性的感受似乎为这一事实所强化，即我们的决策者用来证明自己行动的最经常被复述的政治口号之一，是“别无选择”。如果这个陈述实际上是真实的，而我们却又对它是何等的黯淡不加以注意，这种智慧将继续会被人发挥。如果不尝试对它的忧伤含义作出评判和存疑，就很容易使自己屈从于我们时代这个盲目地具有决定论意义的政治口号所宣称的终极困境，而不是向它提出必要的挑战。

然而，奇怪的是，从不厌倦复述对事态的现存秩序别无选择的政治家，并不犹豫同时将他们自身的交易描述为“可能的技巧”。他们视而不见传统的有关政治的自我辩护（作为具有社会利益的“可能的技巧”）和对资本统治的无批判赞成的屈从之间的鲜明矛盾，依照他们的观点，即所谓“现实世界中”惟一合理的站得住脚的观点，不可能存在一种选择。如果因为不可能就将对统治秩序之规则的一切选择的有效性先验地作为比无望更糟的东西排除掉，作为“对社会上令人称赞的可能的追求”，世界上还有什么政治的意义存在呢？

可以肯定，如此多的决策者——东西方都一样——拥抱这一观念，即对占支配地位的各种规定别无选择，这一事实并不能简单地被视为它的拥护者的一种顺从的个人失常。相反，这种黯淡的观念源自于全球资本制度发展的当前阶段，连同它的一切麻痹的相互依赖性和客观有限的行动界限。因为在商品社会发展的上升阶段，一整套有意义的选择，可以按照有利可图的资本积累的利益以及通过占支配地位的（通常也是构成帝国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扩张来预期（并成功实现）。

在这一方面，情况发生了剧烈变化。因为就本质而不是边缘点缀所及，全球渗透的垄断资本的时代不能容忍议会政治多元主义的实践，曾几何时，该实践可以为改良主义的社会民主策略提供自我辩护。

因此，毫不奇怪，左翼政党最近的崩溃并不限于前（斯大林主义的）共产党的不体面的解体，东西方都如此。在这一方面，更为重要（自相矛盾，也是充满希望）的是，旧世纪的社会民主党关于“渐进”开创社会主义的承诺，由于——以厚颜无耻的直率——放弃对社会主义运动的最初的社会和政治的向往，已经最终证明了它的虚幻特征。今天，由于民主政治的不稳定的条件——在有关“别无选择”的智慧及其直接实践结果的邪恶的共识中一切都暴露无遗，例如，正像工会所经历的极权的合法措施所提示的，尽管一切都只能靠一种激进的超议会的群众运动来矫正，它还是重要和有希望的。在

自我改良的资本主义范围内，如果不破除工人阶级对“渐进”建立“社会主义”的早已成功地制度化的幻想，激进的群众运动就不可能出现。

“别无选择”的自私口号经常还伴随着一个同样带有偏见的自我辩护的从句，它宣称，“在现实世界”中，对所赞同的行动路线（或不作为）不可能存在选择。这个命题被假定为一条自明的真理，自动为一切继续宣称它的人豁免了不能兑付的证明的重负。

然而，在我们询问该问题的时候，他们在谈论何种“现实世界”呢？显然，它是一个极其虚伪的世界。因为在我们实际上碰巧生活的世界中，各种结构性缺陷和爆炸性对抗都被这样一些人作了辩解式的否认和盲目的忽视。他们期望我们相信，在“现实世界”中，对全球资本制度的免除麻烦的功能所必需的条件，我们除了谦恭接受，别无选择。

无论它的对抗是如何具有毁灭性，打着理性、舆论和“现实政治”的名义，我们都被应邀使自身屈从于事态的现存状况。因为在既定秩序的参数之内——被永恒化为基本上不可改变的“现实世界”的合理框架，具有“人性”及其相应的理想的再生产工具：“市场机制”等——面对四处存在的矛盾，找不到任何解决方案。

因此，我们被期待向自己伪称，阶级和阶级矛盾不再存在，或是不再成问题。因此，在如此假定的“现实世界”中，惟一可行的行动路线被假设为必定要忽视我们亲眼见证的结构性不稳定的证据，或是为之“辩解”，以便用魔法手段充满幻想地把我们的社会秩序让我们每天都面临的各种慢性问题和越来越严重的危机症候一扫而光。

正如今天的事实显示的，这种既定秩序的意识形态分子甚至不再相信早期“渐进”改变秩序的流行观念。随着资本主义的上升阶段的结束，任何现实的变化都不再被视为合法的；既不受主要的结构性干预，也确实不能被“渐进”改变。

如果真的如他们所言，对“现实世界”中资本制度的种种结构性限定“别无选择”，既然如此，因果干预的基本观念——无论是如何的强弱——必然会被谴责为荒谬。在这样一种世界观之内，惟一承认的变化属于这一类型，它自身关注某些严格限制的否定性结果，但却令它们的原因基础——进行新陈代谢控制的既定系统——完全不受影响。

然而，在社会革新的领域，如果真的有一种探索配得上被称之为总体荒



谬，它一定不会是去赞成主要的结构性改造，而恰恰是那种将结果与其原因分离的辩护性的幻想式思维。这就是为什么在资本制度的原因框架——贫困产生的剥削性的结构规则——不变的条件下，特别是 20 世纪中的许多次以革新热情宣布的“征服贫困之战”总是失利。

分离结果与其原因的企图，与要求例外的统治地位的同样虚妄的实践是紧密相连的。这就是为什么有人可以伪称，由一小部分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几乎不超过人口的 7%——对人类绝大部分的新殖民统治和剥削所必然造成的悲惨的和慢性的不发展，根本没有关系。因为，正如自私的传奇所描叙的，由于有世界其他部分（从未实现的）“现代化”，每个国家的人口最终有一天会享受“自由企业制度”的巨大利益。

事实是，为了几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利益，对人类和我们星球上的物质资源进行掠夺式的剥削，恰巧构成一种被放纵地忽视的非普遍化的条件。相反，由于忽视无论帝国主义过去的优势，还是巨大利润，是靠连续不断地使“第三世界”处于能被“普遍扩散的”结构性的依附状态而获取的，仿效“先进资本主义的”国家的普遍有效性就受到提倡，为的是通过“现代化”和“自由市场化”创造出预期的幸福结果。没有注意到的一个事实是，即使帝国主义的历史在某种意义上可以按照与它实际展开的方式截然相反的方式改写，随着有利于不发达国家的现存统治和依附的权力关系的虚假颠倒，对我们星球的有限资源的掠夺式利用的普遍接受——尽管当前只是被有特权的少数人实践，但已造成极大破坏——会使整个制度立即崩溃。对于美国人口数量——占不到世界人口的 5%——与其消费总的可利用能源的 25% 这之间的巨大差异，应当给予充分的考虑。如果另外 95% 的人采纳同样的消费方式，试图从剩下的 75% 中挤占出 25% 的 19 倍，无需过多想像就可判断将会发生什么。

掩饰所允诺的正确解决方法的空泛，具有将少数特权者的严格例外的条件转换为普遍统治的便捷的意识形态功能。只有在一个结果可以与其原因分离、甚至与之截然相反的完全虚假的世界中，这样一种探索才被视为切实可行和合理。这就是为什么这两种谬误——第一种谬误将操纵结果的可能性本身独自规定为与其原因分离、第二种谬误是将不能普遍化的概念普遍化——在支配性的“实用主义的”意识形态中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其描述“别无选择”的“现实世界”秩序的主张中，这是一种发现自己的最终的自我辩护和满足的意识形态。



玛格丽特·撒切尔因刻板地否认选择的可能性而赢得 TINA 的绰号——一种英文“别无选择”(There Is No Alternative)的缩写。步撒切尔的后尘，戈尔巴乔夫也曾时常不断地复述同一种智慧。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如此，当保守党强制她撤离办公室时，撒切尔夫人发现，对她来说，不得不要有一种选择。在那一时刻，她叹息说：“这是一个滑稽的旧世界！”然而，她拒绝让我们进到这一秘密，即是否在她看来，“滑稽的旧世界”仍然具有享有“现实世界”的一切都已豁免的地位的资格。

当苏联共产党总书记和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以“别无选择”的名义不仅丧失他的办公室，而且丧失他曾经统治并试图转变为资本主义市场社会的整个国家制度时，他过得也不比撒切尔夫人好多少。但是，他是一个比他的英国同类更为复杂的例子。因为完全可以理解，为何某些像玛格丽特·撒切尔这样的人会全身心地接受资本主义秩序规则所留下的有限行动边界，并把它“内化”为公正和正当——即不仅在事实上，而且在法律上。像男爵夫人撒切尔这样的人是哪里有钱就为哪里说话。

然而，所有这些在对立的社会划分方面又是完全不同的。一旦主张成为社会主义者的人将“别无选择”采纳为替所从事的政治作辩护，他们就和社会主义不再有任何关系。因为社会主义的设计从一开始就正确地被界定为对既定秩序的选择。因此，毫不奇怪，在他当政的岁月，戈尔巴乔夫转向“别无选择”的哲学的后果，是他甚至只好放弃对社会主义的暧昧涉猎。他在辞职演说中幻想未来时，以一种完全的社会空白而告终——“民主和繁荣”。在他被抛弃的悲惨遗产的条件下，他的良好愿望对他的饥饿的同胞们，必然显得尤其空洞。

但是，也许可能是，政治领袖热衷于执行资本制度的规则，并不是要消除它的结构性缺陷和潜在的爆破性对抗。与不费力气培育的统治秩序的神话相反，危险的矛盾是内在于它、而不是外在于它的。这就是为什么在旧的“外部敌人”投降和经历“冷战结束”的短暂的胜利庆典之后，今天的世界比从前处于一种更不稳定的状态。

从最近的发展看来，给他们带来的不仅是不可能改革的斯大林主义的苏联体制（及其从前在东欧的依附疆域）的破碎瓦解，而且还有资本主义西方建立在苏联的瓦解之上的幻想大厦的坍塌。只有傻瓜才相信，我们现在可以毫无障碍地迈向自由资本主义的新千年。然而，真实情况是，现存秩序不仅通过不断增长的社会经济的“功能紊乱”——由日常将它的不人道强加



给成千上万的“不幸的”人而引起——证明了它的站不住脚。它还通过最珍贵的幻想的惊人的紧缩——该幻想涉及资本主义先进世界对昨天的敌人的胜利所具有的不可逆转的社会经济方面的稳定力量——证明了它的站不住脚。

撇开前不久经历的一切挫折和痛苦失望不论，意识到这种站不住脚，有助于维持对一种基本的结构性变革抱有希望。挖肉补疮——它恰巧是当前的发展阶段所选择的解决问题的方法——是不能无限期地继续的。所以，考虑到更具威胁性的不稳定性，通过一种向完全不同的社会秩序的能承受的转变，从全球资本制度的矛盾的迷茫中找到一条出路，在今天显得比以前更为紧迫。

从 20 世纪的发展和失望来看，对既定秩序构建一种可行的选择，这一历史挑战必然要求对社会主义的策略框架及其实现的条件有一个重要的重新认可。我们急需一种社会主义过渡理论，它不仅是对“历史的终结”的荒谬理论化的矫正，而且是对同时伴随的所谓社会主义过早埋葬的矫正。按照其自身的积极条件，为了重新审查社会主义理论的概念框架——它最初是相对于欧洲的“小小角落”设计的——需要有一种过渡理论。

与局限于有限的欧洲背景的资本主义发展的客观可能性相对照，由一种极其强大的体制的全球联合——与其相关于价值规律的“古典的”类型相对照，它呈现为一种“混合的”形式，并在最近一个半世纪通过资本的历史优势展开——所引发的严重问题，对有必要重新阐述原初社会主义的解放策略具有深远的意义。我们在这个世纪已经见证的这种令人困惑的转变和逆转，只有在这种宽泛的全球资本制度的框架内，才能得到理解，因为它逐渐以其动态的和矛盾的历史现实支配着世界。这同样适应实现以真正社会主义为指向的基本的结构性变革的可能性：它应当是可行并令人信服，在同样的历史动力的条件下，通过联合劳动者的自治的社会主义控制方式，意味着对“现存的”全球资本制度提供了完全必要的选择。

超越从“新的世界秩序”的幻想中建立的全球性“波特金村”（Potemkin Village）的虚假稳定性，指出预示既定社会经济和政治秩序之崩溃的危机征兆，并不十分困难。然而，资本制度的深刻的结构性危机本身远不足以自动成功地鼓舞信心。应该将一份份信心按照预期的路线以积极的方式收集和会聚在一起。即使最深刻的危机或最严重的崩溃本身在这一方面也



不会有太大的帮助。

说“不”总是比即使是直率地勾勒出对消极对象的积极选择要容易得多。甚至只有在有关整个社会复合体的一以贯之的策略的观点之上，对现实存在的局部否定才能被视为似乎有理和合法的。因为，由对既存条件的任何严肃的否定所提供的选择——无论是明确的还是暗示的——在其自身的社会总体的框架内，都必须是可维持的，只要它还对成功地反对潜在地总是“混合的”既定世界——批判的力量试图对它发动袭击——的“统一”权力还抱有任何希望。

正如当初所设想的，社会主义设计的重点恰恰是反对将这样一种策略性的总体选择同现实存在对立起来，而不是要以一种聚合的方式对它的某些最明显的缺陷作修补。因为尽管它存在危机，但在新的“混合的”体制内，后者只能促进——正如各种改良主义确实尝试过的——资本的新陈代谢的控制方式的运作。

随着时间的推移，商品社会的社会主义的政治对手因统治秩序所能提供的各种奖赏而变得毫无希望地分裂。与此同时，资本制度自身却成功地采纳了一切社会民主党提出的局部批评，将原初的社会主义观点削弱为一种策略选择。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可以理解是从它自身的立场出发的——宣布，“整体主义”是意识形态之敌，并以这种认识断言，如果它的可理解性（以及潜在的合法性）的总体化框架在范畴上受到“不合法”的统治，由于借助于“整体主义”（或它的几个等值物）的驱邪的伪哲学符咒，即使是最尖锐的局部批评也会变得十分无力。

因此，在资本主义国家，肯定地赞成资本的总体框架和命令结构，成了一切合法的政治话语的绝对前提，并被社会民主党/工党的对话者自愿地作为共同的参照系来接受。与此同时，尽管在口头上持激进主义，斯大林主义以其自身的方式密切反映的资本的命令结构，将对真正的社会主义目标的记忆、连同无数曾经仍然对追求原初设想的解放直接保持信念的战士一起清洗掉。

因此，难以理解的是，这两种主要的对国际工人运动的实际曲解——它们派生于完全不同的社会历史环境——致命地削弱了一切他们长期虚假地认同的有关社会主义有效性的信仰。实际上，非但不反对既定秩序持一以贯之的和全面的社会主义的否定，在特殊历史条件下，它们分别代表了不抵抗路线，以便自行使社会控制的方式适应难以矫正的等级制资本制度的内在